

## 主体困境与欲望书写：重读中国朝鲜族“逆移民”叙事

范 靛<sup>1</sup>，李海英<sup>2</sup>

**[摘要]**《无根花》《谁曾见过蝴蝶的家》与《中国媳妇》三部曲，作为中国朝鲜族“逆移民”书写的典范，通过寻亲、偷渡与国际婚姻的寓言式叙事，清晰勾勒出中韩建交以后朝鲜族作家身份建构意识的演变轨迹：从 20 世纪 90 年代对“他者”欲望的审视与否定，经 21 世纪 00 年代对自我欲望的肯定与追寻，至 21 世纪 10 年代最终完成对欲望的超克与独立主体性的建立。该演变过程既是中国朝鲜族应对现代性冲击的精神探索实录，也深刻揭示了在跨文化语境中构建民族身份认同的复杂性与可能性。

**[关键词]** “逆移民”；主体；欲望；朝鲜族

**[中图分类号]** I29.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007 (2026) 01-025-08

**[收稿日期]** 2025-01-18

**[基金项目]** 韩国教育部核心大学韩国研究项目“作为研究方法的东亚，作为实践课题的韩国学：中国韩国学核心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与推广”，项目编号：AKS-2022-OLU-2250001。

**[作者简介]** 1. 范靛，女，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朝鲜族文学、中韩比较文学；2. 李海英，女，朝鲜族，中国海洋大学朝鲜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朝鲜族文学、韩国近现代文学、中韩比较文学。（青岛 266000）

DOI:10.19410/j.cnki.cn22-5016/c.2026.01.010

### 一、引言

1992 年的中韩建交为中国朝鲜族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参照系——韩国，也由此开启了中国朝鲜族向韩国反向移民的序幕。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朝鲜族文学界兴起了一股以“逆移民”为主题的书写热潮。不少朝鲜族作家将视线投向朝鲜半岛，他们从主体身份出发，通过描绘中国朝鲜族在韩国的生活遭遇、生存困境与认同焦虑，反思社会环境剧变对个体造成的异化与侵蚀，并聚焦于民族文化心理的波动与民族共同体的重新定位。其中，中国朝鲜族女作家许连顺自 1989 年首次以探亲名义去往韩国后，保持每年一至两次的赴韩频率。凭借频繁往来中韩之间的真实生活经历与细致敏锐的观察，她分别以寻亲、偷渡和国际婚姻这三种中韩交流典型现象为主题，先后创作了《无根花》《谁曾见过蝴蝶的家》（以下简称《蝴蝶》）与《中国媳妇》三部长篇小说。这些作品分别对应 20 世纪 90 年代、21 世纪 00 年代和 21 世纪 10 年代三个不同时期，艺术地再现了中韩建交后中国朝鲜族在身份认同上的困惑与寻根路上的艰难，共同构成了“逆移民”叙事中最具代表性的三部曲。许连顺也因此被誉为书写中国朝鲜族“逆移民”题材的中坚作家。

自发表以来，三部作品一直深受中国朝鲜族文坛和学界的关注。从目前的先行研究来看，国内

外学者大都从身份认同与离散文学角度，或以单部作品为研究对象进行具体探讨<sup>①</sup>，或与其他作品进行比较研究<sup>②</sup>，或进行三部作品的整体性研究<sup>③</sup>。学者们先后考察了三部作品中出现的韩国形象、在韩中国朝鲜族形象以及主人公的身份认同意识变化，对比分析了与其他作品所建构的中国朝鲜族形象及身份认同的异同，并通过对作品中朝鲜族在韩一系列不适感和焦虑感的原因探析，阐明了朝鲜族具有民族和国家双重认同的必然性，总结出三部曲中朝鲜族的国家认同意识整体呈上升趋势，且其有异于以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理念下塑造的国家认同，是朝鲜族在亲历韩国生活之后，逐渐形成的一种自觉自发的认同意识。

通过以上先行研究可以发现，朝鲜族的身份认同与主体建构始终是中国朝鲜族“逆移民”叙事研究中无法规避的一个焦点。肩负民族责任感的朝鲜族作家们，在作为“民族精神训练场”<sup>④</sup>的“逆移民”叙事中，不断思考着身处两种或多种文化重叠共生场中的朝鲜族的身份认同焦虑与主体生成问题，探索着朝鲜族在多元文化中所应具有的自立精神与立足之根。然而，对于朝鲜族身份认同与主体建构的探究离不开精神分析学的核心问题——欲望问题的探究。因为欲望是人类精神的基本动力，尤其是那种不断努力“通过（他者的）承认和克服差异”<sup>⑤</sup>而最终认识自己，从而满足主体的欲望，所以“欲望与获得意识的过程以及主体逐渐增强的自我认识的能力密切相关”<sup>⑥</sup>。基于此，本文拟以三部不同主题的朝鲜族“逆移民”长篇小说为文本，梳理和检视中韩建交后以许连顺为代表的朝鲜族作家们对欲望问题的思考以及由此产生的意识变迁，并进一步辨析这些意识变迁对其塑造朝鲜族形象、建构朝鲜族主体身份产生的影响，最终尝试总结和阐释朝鲜族作家通过“逆移民”叙事形塑了何种朝鲜族主体身份。

## 二、《无根花》：“他者”的欲望和对欲望的否定

1996年，第一部反映朝鲜族在韩生活的长篇小说《无根花》由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出版。该小说讲述了朝鲜族中年人洪志河为完成父亲“安静地躺在故乡土地上”<sup>⑦</sup>的临终遗愿，带着父亲的骨灰盒前往韩国寻找爷爷，并在韩亲历了一系列不公与寻根失败之后，重返中国的故事。

① 关于三部曲单部作品的研究有：金虎雄、金宽雄：《双重身份和文学叙事——以许连顺长篇小说〈谁曾见到蝴蝶的家〉为中心》，《统一人文学》，第47辑，2009年；韩红花：《通过〈无根花〉探究中国朝鲜族民族身份的变化形式》，《韩国民族文化》，第38期，2010年；李光在、池海燕：《朝鲜族农村女性的生存特征——以〈谁曾见到蝴蝶的家〉为中心》，《韩中人文研究》，第32期，2011年；[韩]宋贤浩：《中国朝鲜族移民第三代的生活风景——以〈谁曾见到蝴蝶的家〉为中心》，《现代小说研究》第46卷，2011年；[韩]吴升姬：《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中国朝鲜族小说中出现的现代性克服意识——以许连顺小说〈谁曾见到蝴蝶的家〉为中心》，《国语国文学学会学术大会资料集》，2012年；金美兰：《许连顺〈中国媳妇〉中出现的离散治愈样相》，《现代小说研究》第60卷，2015年；金丽：《许连顺长篇小说〈无根花〉人物形象研究》，延边大学学位论文，2020年等。

② 关于三部曲与其他作品的比较研究有：严正子：《朝鲜族的离散和新的逃离——崔曙海的〈红焰〉和许连顺的〈谁曾见到蝴蝶的家〉比较》，《2007年朝鲜族优秀作品集》，哈尔滨：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08年；[韩]崔宇吉：《中国朝鲜族女作家作品中出现的韩国——以许连顺和李惠善的作品为中心》，《国际语文学学会学术大会资料集》，2008年；韩美花：《许连顺的〈蝴蝶〉与梅里美的〈塔芒戈〉中的空间结构比较研究》，延边大学学位论文，2010年；崔娜：《“此处”多于“彼处”：小说〈茉莉花〉与〈无根花〉中离散族裔身份的重构》，延边大学学位论文，2017年；朴银珠：《许连顺与严歌苓作品的悲剧叙事比较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位论文，2019年等。

③ 关于三部曲的整体研究有：吴相顺：《朝鲜族女性作家许连顺的小说和当代男性作家小说中体现的“寻根意识”研究——以20世纪末发表的小说为例》，《女性文学研究》，第12期，2004年；[韩]崔炳宇：《许连顺长篇小说中身份的变化：以〈无根花〉〈谁曾见到蝴蝶的家〉〈中国媳妇〉为中心》，《女性文学研究》，第71期，2015年；金春燕：《许连顺韩国叙事小说中的文化身份认同意识研究》，延边大学学位论文，2016年；裴磊敏：《许连顺长篇小说的底层叙事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位论文，2019年。

④ 方龙男：《从文化的特殊性看中国朝鲜族文学的历史使命》，《批评文学》，1999年，第13期，第485页。

⑤ 严泽胜：《朱迪·巴特勒：欲望、身体、性别表演》，《国外理论动态》，2004年，第4期，第39页。

⑥ 严泽胜：《朱迪·巴特勒：欲望、身体、性别表演》，《国外理论动态》，2004年，第4期，第39页。

⑦ 许连顺：《无根花》，哈尔滨：黑龙江民族出版社，1996年，第32页。

在小说序言中，作者许连顺开篇便将朝鲜族自喻为“流浪的无根花”<sup>①</sup>，展现了自己对朝鲜族在中国和韩国两个不同文化地理空间中不停徘徊、无法扎根的身份困惑。在她看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朝鲜半岛，如无根花般的朝鲜族都会“对另一个地方不断回忆和遗忘、思念和怨恨”，他们“在两个世界中共存，也试图从两个世界中一起摆脱出去”<sup>②</sup>，他们深陷这种矛盾与痛苦之中，无法自拔，以至发出了“我是谁？”的疑问。然而，许连顺认为无根花并不是无根的，它的根之生成源自内心欲望之“风”的停止，是主体得到自我满足之后的欲望消失。于是，她继续提出了第二个问题，“风果真可以停下来吗？”<sup>③</sup>显然，在许连顺的意识中，欲望之“风”在中韩两个空间中是摇摆不定、踟蹰彷徨的，如何让风停止吹动，让无根花落地生根，即朝鲜族怎样才能生成一个独立而坚定的主体成为了摆在许连顺面前的一道难题。

事实上，欲望是他者的欲望，即“主体最初借助于自身像及他人躯体作为媒介找出且认出了欲望”<sup>④</sup>。因此，生成主体需要“自我”与“他者”两个相互的参照物，“他者对于自我的定义、建构和完善必不可少，自我的形成依赖于自我与他者的差异、依赖于自我成功地将自己与他者区分开来”<sup>⑤</sup>。《无根花》中的朝鲜族也是通过“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相互博弈，从焦虑迷茫的“自我”走向富有价值感与存在感的独立个体，走向“真正”的自我身份确证。然而，这里的“他者”并非稳定单一的存在。对《无根花》的主人公洪志河而言，“他者”是为了吞并巨额遗产，拒绝承认自己是爷爷亲孙子的同父异母兄弟洪成标与继母安氏；是以“不是公司正式员工”为由，拒绝赔付工伤费用，并威胁要告发他们“非法滞留者”身份，“强制他们驱逐出境”<sup>⑥</sup>的韩国公司李社长；是用400万韩元的廉价费用雇佣朝鲜族女人惠京进行代孕，并在得知孕晚期的惠京得了肺结核后，单方面违约，逼死惠京的姜社长。这些掌握社会财富与权力的权威性“他者”，给洪志河带来了无尽的伤害与疏离。除此之外，还有一类“他者”，他们是在韩因高空作业不慎跌落，摔成重伤的洪志河的挚友崔仁奎；是为救治丈夫，不惜成为代孕妈妈，被逼自杀的崔仁奎的妻子惠京；是因热心帮助洪志河寻到爷爷，公开爷爷遗书内容，而被安氏母子诋毁为“妓女”“伪造犯”的洪志河的红颜知己韩国少女徐恩美；是最初因对朝鲜族存有偏见，不断挑衅洪志河，最终与其化敌为友的韩国船夫吴斗石。与李社长、姜社长等权威性“他者”相比，这类“他者”是社会中的弱者，不断引发洪志河反思与自省。由此，通过父亲回忆建构起的想象空间“韩国”与亲身体验的地理空间“韩国”，在洪志河的认知中逐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洪志河也恰是在与这些不同“他者”的对抗与和解的过程中，逐渐进行着“自我”主体化的蜕变与生成。

洪志河最终意识到，在“崇尚物质主义、金钱万能主义”的韩国，“朝鲜族被视作来自异邦的他民族，就像是稻子的稻粒、漂浮在水上的油一样”无法与之相容，“韩国不是他的立足之地”，“回国是他最迫切的想法”<sup>⑦</sup>。由此可见，在《无根花》中，对“朝鲜族怎样才能生成一个独立而坚定的主体”这一困惑，许连顺给出的答案是回归中国。拉康强调，人的欲望要求“自我”与“他者”互相“承认”，显然，许连顺“回归中国”这一答案陷入了拉康式“承认”困境：洪志河的欲望始终指向与“他者”的互相确认，但韩国社会的权威性“他者”对其只有压榨与排斥，弱势“他者”也仅能唤起他作为同类弱者的共情，却无法赋予其主体身份的认可。这种双重的“不被承认”，使

① 许连顺：《无根花》，哈尔滨：黑龙江民族出版社，1996年，第1页。

② 许连顺：《无根花》，哈尔滨：黑龙江民族出版社，1996年，第1页。

③ 许连顺：《无根花》，哈尔滨：黑龙江民族出版社，1996年，第1页。

④ Lacan (Jacques), trans. John Forrester,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I: Freud's Papers on Technique 1953 - 1954*, New York: Norton, 1991, p.146.

⑤ 张剑：《西方文论关键词：他者》，《外国文学》，2011年第1期，第118页。

⑥ 许连顺：《无根花》，哈尔滨：黑龙江民族出版社，1996年，第85页。

⑦ 许连顺：《无根花》，哈尔滨：黑龙江民族出版社，1996年，第265页。

得回归中国成为洪志河在权威性“他者”压迫与弱势“他者”绝望下的被动逃逸。若以德勒兹“生成——他者”理论审视这一“回归”，其局限性更趋明显。德勒兹指出“生成”并非被动适应，而是通过“对强势力量的弱势化”来实现创造，从而打破僵化的统治结构。然而，洪志河的回归在本质上并非一种创造性的“生成”，而更像是一种被动逃逸。这种被动逃逸性回归既没有对“强势力量”——姜社长等权威性“他者”进行弱势化，也没能对弱势“他者”——崔仁奎等人进行创造。因此，这些“他者”只是加速了洪志河主体意识的觉醒与生成，即“只有来到韩国才能够意识到自己是个中国人”<sup>①</sup>，却并未真正导向一个独立而坚定的主体的完整生成。他逃离了“他者”的压迫，却尚未在回归中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生成”。

正因为如此，原本“不停地在两个世界徘徊”的洪志河依然悲伤于自己“无根之树的身世”<sup>②</sup>，对自己的前妻宁愿嫁给韩国船夫也不肯回国的行为感到不解，对自己的儿子也要经历先辈们曾经历过的生离死别而深感无奈，并将这种痛苦简单地归因为“不合理的欲望和过分的渴望”<sup>③</sup>。归乡之际，洪志河站在即将回国的朝鲜族人群之中，看着人头攒动的码头，内心感慨“轻率地抱着希望或欲望，是让人心里多么痛苦和悲痛啊……如果幼虫不钻进阴暗洞穴般的茧里，梳着翅膀，变成蛾子，那么就不会有跳进火堆里那样愚蠢的事情发生”<sup>④</sup>。可见，在许连顺看来，《无根花》中的朝鲜族，无论是来韩淘金的崔仁奎夫妇，还是寻根问祖的洪志河，都像带着欲望钻进阴暗臭水沟的幼虫，期待在“金钱至上主义”的韩国“以崭新的面貌飞出去”<sup>⑤</sup>，化茧成蝶。然而，这一欲望却让他们付出了“跳进火堆”般的惨痛代价，甚至生命。换言之，尽管此时许连顺意识到回归中国是朝鲜族的最终归宿，但她内心希望被他人承认的欲望之风却始终没有停止过，所以，才会将朝鲜族回归中国描述成痛苦经历后的无奈之选。

然而，无论是洪志河的寻根问祖，还是崔仁奎夫妇的打工赚钱改善生活，果真是“不合理”的欲望吗？或者说他们的身份认同困惑是否真正源自于“欲望”？萨特曾指出，作为一个“自为存在”的人“是一个拥有主观生命规划的人，而不是一种苔藓或者一种真菌，或者一颗花椰菜”<sup>⑥</sup>。显然，真正独立的主体并非权威性“他者”压榨下的被迫妥协，而是在能够体现自我意志的、持续自由选择过程中生成的。因此，通过压抑欲望实现的主体建构并不能被视为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主体，即《无根花》中塑造的主人公并未真正解决自身的身份认同困惑。对欲望的否定，让他既没有寻找到支撑自我独立的精神之根，更未生成一个独立的自为存在，而这恰恰体现了这一时期朝鲜族“逆移民”叙事的局限性。

### 三、《蝴蝶》：寻找存在的意义和对欲望的肯定

2003年3月至2004年6月，《长白山》杂志连载了另一部朝鲜族长篇“逆移民”叙事小说《蝴蝶》。这部小说讲述了8名朝鲜族人因各种原因踏上偷渡韩国的海上之旅，最终失败的故事。关于这部小说的创作目的，我们大概可以通过2015年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中文译本《蝴蝶》的“作者寄语”窥探一二。

谁曾见过蝴蝶的家？可能没有一个人见过吧。那是因为蝴蝶原本就没有什么家。可是，

① 金在国：《韩国不在》，京畿道：民艺堂，1996年，第246页。

② 许连顺：《无根花》，哈尔滨：黑龙江民族出版社，1996年，第358页。

③ 许连顺：《无根花》，哈尔滨：黑龙江民族出版社，1996年，第357页。

④ 许连顺：《无根花》，哈尔滨：黑龙江民族出版社，1996年，第359页。

⑤ 许连顺：《无根花》，哈尔滨：黑龙江民族出版社，1996年，第346页。

⑥ [美]让·保罗·萨特著：《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汤永宽、周煦良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7页。

小说里的我的主人公，却四处漂流，想要寻找自己的家，其实就是终生苦苦寻找原本不存在的东西。犹如看见死亡就能看见生命，我意欲在不在中寻找存在的意义。因为不存在的东西，才会展示最确切的存在，同时让人们看到最不确切的存在。<sup>①</sup>

恰如拉康所言，主体的欲望对象，正是其缺乏或本来就不存在的事物<sup>②</sup>，即欲望源于存在的缺失，源自它的不可满足性。小说中的8名朝鲜族人就像没有家，却不断寻找家的蝴蝶一样，终其一生都带着“寻找存在的意义”的欲望，“苦苦寻找原本不存在的东西”，探索着建构主体身份的答案。譬如一个渴望拥有却始终未能得到家的“寻找者”——故事的女主人公安世熙。世熙童年时，父母因“反革命”罪被捕入狱，6岁的她被寄养到乡下的大伯家，开始了孤儿般的寄人篱下的生活。在新的生存空间里，世熙被家里的伯母、堂哥冷落和嫌弃，被村里的孩子们孤立和戏弄，最终沦落为一个无家可归的边缘人。少年时，世熙目睹了被造反派打得奄奄一息的父亲在自己面前撒手人寰，撞见了母亲与父亲的朋友偷情，并在逃离母亲、寻找父爱的过程中被姨夫强暴，最终成为一个有家不想回的孤独者。成年后，世熙面对婚姻，第一次选择嫁给自己所爱之人，却在丈夫持续的家暴和不断的出轨中绝望地选择了离婚；第二次选择嫁给一个深爱自己的人，面对一门心思迎合她的丈夫，世熙却感觉自己像是“笼中鸟，失去了自由”<sup>③</sup>，最终在无法呼吸的窒息中选择了离婚；第三次嫁给了一个沉浸在丧妻之痛中无法自拔的男人，这段婚姻则随着男人在前妻的幻影中卧轨自杀而结束。

最终，世熙还是选择独自一人，带着两个同母异父的儿子艰难度日，并不由自主地踏上了偷渡之路。世熙的偷渡表面上是她要去韩国赚钱，让儿子“都有独立的房间，有电脑，有吃不完的香肠”<sup>④</sup>，但实际是缺失心灵安栖之地的她始终感觉“所渴望的家总是在另外的地方”<sup>⑤</sup>。世熙内心对“家”的欲望促使她在经历各种失败之后，不受控制地选择抛下儿子，独自去寻找内心渴望的“家”。然而，世熙所要寻找的“家”究竟是什么、在哪里，实际上连本人也是模糊的。

除了世熙，《蝴蝶》里还刻画了众多努力诉说“寻找存在的意义”的朝鲜族人：童年时两度遭遇养父母遗弃，少年时因身份造假几乎被批斗致死，成年后为筹集昂贵医药费而放弃写作，却仍未能挽回妻子生命的有燮；无法原谅自己抛弃小狗，不断徘徊寻找的世熙的儿子龙儿；为儿子冤死鸣冤，不顾生命危险，一次次踏上偷渡船的末淑……应该说，作家许连顺带着对“寻找存在的意义”的思考而刻画的众生相，最终让她意识到欲望是“充盈的、盲目涌动的生命强力，它不是对禁止的屈从，而是创造性和生产性的”，而“存在是对欲望的质询”<sup>⑥</sup>。因此，能不能找到“证明存在的任何东西”<sup>⑦</sup>已经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于存在的缺失和不可满足的欲望中不断寻找的过程。

恰是因为这一意识，许连顺对“欲望”的认知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无根花》中，她指出过分的欲望让人万劫不复，比如朝鲜族崔仁奎夫妇的消失，同父异母韩国兄弟的道德沦丧。因此，她认为幼虫应该抛弃钻进臭水沟、化茧成蝶的欲望，只有这样才可以避免飞蛾扑火这种愚蠢的行为；十年后，许连顺在《蝴蝶》中看似客观地描述着化茧成蝶的过程，实则是展现了对这一蜕变过程的肯定与赞美。她惊叹道，幼虫“为了做茧而吐的丝竟然长达40公里”<sup>⑧</sup>，这是一次“崇高而艰苦卓

① 许连顺：《为了“存在”的“不在”的意义》，《谁曾见过蝴蝶的家》，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年，第258页。

② 黄汉平：《拉康的主体理论与欲望学说》，《文学评论》，2010年第3期，第197页。

③ 许连顺：《谁曾见过蝴蝶的家》，首尔：onbooks，2007年，第259页。

④ 许连顺：《谁曾见过蝴蝶的家》，首尔：onbooks，2007年，第341页。

⑤ 许连顺：《谁曾见过蝴蝶的家》，首尔：onbooks，2007年，第4页。

⑥ 严泽胜：《朱迪·巴特勒：欲望、身体、性别表演》，《国外理论动态》，2004年第4期，第39-40页。

⑦ [美]让·保罗·萨特著：《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汤永宽、周煦良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259页。

⑧ 许连顺：《谁曾见过蝴蝶的家》，首尔：onbooks，2007年，第332页。

绝的努力”<sup>①</sup>，幻化而成的“蝴蝶看起来柔弱，却力大无比”<sup>②</sup>；她为蝴蝶正名，指出飞蛾扑火的欲望只是出于飞翔的生存本能，并非愚蠢的行为，同样人类为了生存而存有欲望也是理所当然的。由此可见，许连顺对化茧成蝶的评价出现了一个从“愚蠢”到“崇高”的颠覆性转变嬗变。幼虫作茧羽化的努力，飞蛾扑火的勇气，就像出现身份认同困惑，失去“家”又寻找“家”<sup>③</sup>的8位朝鲜族偷渡者，他们为了寻找自己的“家”，成为有意义的存在，即使有葬身于大海的死亡危险也在所不惜。换言之，蝴蝶的生存意义在于飞翔，8人的生存意义在于带着不可满足性的欲望不断寻找，寻找那些根本找寻不到的东西。

在这样的意识转变中，许连顺思考着拥有正当合理欲望的朝鲜族应该如何通过自己的意愿来造就和确定“自我”，从而解决身份认同焦虑，建构自我。然而，对存在的缺失，或者说欲望的不可满足性，此时的她无从破解。所以，小说的结尾这样写道：“虽然现在已经抵达港口，港口却不能给他们带来安慰。没等靠岸，连岸都没踏上，船只重新被推向大海。从远处延伸过来的航线被黑暗淹没，在沉默中，波涛如死一般沉寂”<sup>④</sup>。可见，《蝴蝶》虽然写出了寻找的意义，肯定了人的欲望，却没有写出欲望的结尾。换言之，《蝴蝶》中的痛苦不安成为欲望的外在表现形式，并持续存在，成为许连顺及其他朝鲜族作家继续寻找身份认同的源源动力。

#### 四、《中国媳妇》：从无根花到石竹花和对欲望的超克

2014年1月到12月，《延边文学》连载了书写中韩跨国婚姻的“逆移民”长篇小说《中国媳妇》。与前两部小说不同，小说的女主人公赵丹是一位汉朝混血儿，嫁给了一个对她隐瞒身体残疾的韩国人金道奎。因此，赵丹的身份认同困惑既来自于少年时因混血儿身份被同学的嘲弄，也来自于中韩国际婚姻中的自我身份定位。

上学的时候，赵丹常常因为混血儿身份被同学戏弄。“汉族的孩子们戏称她为‘高丽棒子’，朝鲜族的孩子们则会嘲笑她为‘山东棒子’。当朝鲜族孩子和汉族孩子混在一起的时候，朝鲜族孩子则嘲笑她是‘杂种’，汉族孩子嘲笑她是‘儿崽子’。”<sup>⑤</sup>这些带着侮辱性的称呼，以及同学们异样的眼光，让尚未形成稳定身份认知的赵丹陷入深深的困惑，她不明白自己与同伴究竟有何不同，为何独独被排除在汉族或朝鲜族的群体之外。这种“不被归属”的处境，使赵丹在需要通过同伴交往、与他者建立融洽社交关系、确认身份认同的极为关键的少年时期，被动地成为了这些孩子眼里的“异常者”。即来自于“他者”的否定与排斥，使她无法融入集体，获得同伴支持，继而造成了她在身份认同建立的关键时期出现了身份认知失败，同时也激发了她要认识自我的欲望。

成年后的赵丹，在母亲自杀、父亲重组家庭、初恋龙儿被射杀之后，选择逃离原生地理空间，远嫁韩国。然而在避难之地韩国，赵丹再次受尽伤害，甚至先后两次被诬陷入狱。值得注意的是，两次被丈夫金道奎从狱中救出的赵丹却展现出了完全不同的心路历程。

赵丹的第一次入狱发生在去韩不久之际。丈夫金道奎身体残疾的事实被她发现，无法忍受这巨大的欺瞒的她毅然离家出走，开始在异乡自食其力，然而命运的坎坷并未结束。不久，因利益冲突，赵丹被同为在韩打工的朝鲜族同胞华研恶意举报，身陷囹圄。在她最无助的时刻，金道奎出手相救，将她从牢狱之灾中拉出。这段患难经历让两人原本冰冷的关系悄然趋向缓和。面对这个曾对她隐瞒身体残疾、如今却袒露痛苦往事的男人，赵丹感到一种无声的和解在心底蔓延。她感觉“心不知不

① 许连顺：《谁曾见过蝴蝶的家》，首尔：onbooks，2007年，第332页。

② 许连顺：《谁曾见过蝴蝶的家》，首尔：onbooks，2007年，第333页。

③ 金宽雄：《徘徊在失“家”与寻“家”中的迷失的悲剧——关于许连顺的长篇小说〈谁曾见过蝴蝶的家〉的离散文学主题》，《朝鲜—韩国语言文学研究6》，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246页。

④ 许连顺：《谁曾见过蝴蝶的家》，首尔：onbooks，2007年，第353页。

⑤ 许连顺：《中国媳妇》，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63页。

觉间已经原谅了男人。男人把自己的过去讲给她听，就像离开了自己的洞穴一样，而她本人却荒唐地觉得慢慢地被关进了男人已经离开的洞穴”<sup>①</sup>。然而，这种从一个“洞穴”走进另一个“洞穴”的做法，并没有让赵丹完成自我的真正独立，获得精神上的解脱。因此，在短暂回国处理完父亲后事之后，她对自己的未来之路感到迷茫，觉得“人在哪里生活都一样”，要去哪里、在哪儿生活都成了“临时的权宜之计”<sup>②</sup>，于是她再次回到了韩国。德勒兹说：“树强行规定了动词‘是’（être），而根茎则将连词‘和（et）……和……和……和’作为自己的织体。正是在此种连接之中，存在着足够的强力，它可以撼动并根除动词‘是’”<sup>③</sup>。可见，赵丹需要的生成是“一个本质上异质的存在”<sup>④</sup>，即赵丹只有“通过与他者的复杂关系进行”“自我的无限客观化”<sup>⑤</sup>的主体化，获得他者承认，生成足够强劲的主体意识，才可能“撼动并根除”他者规定的“旧我”。

赵丹的第二次入狱发生在她等待旅馆破产后失踪的金道奎归来之时。她来到金道奎的乡下舅妈家，开启了长达一年的漫长等待。金道奎的好友京石常来安慰赵丹，为她拍摄了大量生活照片，并举办了以“中国媳妇”为主题的摄影展，这引起了京石妻子的误会。京石妻子对赵丹各种辱骂殴打，并举报赵丹伪装结婚，导致其再次入狱。幸好金道奎及时出现，将赵丹从狱中救出。然而，面对金道奎这次的出手相救，赵丹没有再次迷失自我，而是选择回归中国，回到“像向日葵一样等待姐姐”<sup>⑥</sup>的同父异母弟弟灿的身边。与《无根花》中洪志河无奈而心情复杂地离开韩国不同，赵丹选择离开是为了让自己“心情轻松”<sup>⑦</sup>。此时的“中国媳妇”赵丹，无论是在丈夫心中，还是在丈夫的朋友京石心中，都已经变成了“只有走到边界的尽头才能见到的石竹花，永远相隔那么远，想摸也摸不到的石竹花”<sup>⑧</sup>，那是万花丛中唯一的一朵，“虽然只有一朵，但比周围任何一朵花都清晰、鲜明、美丽”<sup>⑨</sup>。

无根花随风飘动，居无定所；石竹花一枝独放，美丽自信。从无根花到石竹花，展现了许连顺对民族自身定位的认识变化。如“无根花”的洪志河，在韩国受尽伤害，痛苦不已，逃避式选择回国；如“石竹花”的赵丹却在韩国丈夫的极力挽留中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不想再有其他的欲望”<sup>⑩</sup>，毅然决然地选择离开。这里看似是主人公对“欲望”的压制，实则是主人公主体化的生成。可以说，在经历了《无根花》对欲望的否定，《蝴蝶》对欲望的肯定，对欲望的超克在《中国媳妇》中得以真正实现。赵丹曾经因为欲望远嫁他乡，因为欲望苦等丈夫一年之久。这种依靠他者实现的欲望不仅没有让赵丹感到真正的幸福与满足，反而给她带来无尽的痛苦。最终，赵丹释然地放下这些欲望，选择依靠自己，并成为他者的依靠，就像是旅行之后对在地日常生活的回归，选择原谅曾经伤害过母亲与自己的父亲，回国直面自己同父异母的脑瘫弟弟，从而完成了作为独立个体的真正生成。

小说最后，金道奎来到中国寻找自己的挚爱赵丹，两人相视一笑，感慨道：

平时认为的那些微不足道和毫无意义的东西就是生活的本质。毫无疑问，琐碎的事

① 许连顺：《中国媳妇》，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62页。

② 许连顺：《中国媳妇》，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23页。

③ [法]吉尔·德勒兹、费利克斯·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姜宇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21-22页。

④ [美]尤金·W·霍兰德：《导读德勒兹与加塔利〈千高原〉》，周吟吟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9页。

⑤ [法]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余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98-499页。

⑥ 许连顺：《中国媳妇》，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94页。

⑦ 许连顺：《中国媳妇》，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84页。

⑧ 许连顺：《中国媳妇》，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83页。

⑨ 许连顺：《中国媳妇》，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91页。

⑩ 许连顺：《中国媳妇》，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84页。

情能够抓住人们的生活，并让他们坚持下去。<sup>①</sup>

无论多么真挚的事件，大多都是由非常琐碎、无所谓的缘分组成的。<sup>②</sup>

由此可见，汉朝混血儿赵丹在此刻早已卸去了精神上的重负，带着坚定自信的力量和关怀他人的真诚，与汉族弟弟和韩国人丈夫尝试在那些日常的、“微不足道”的、“琐碎的事情”中建立一个“爱的共同体”。应该说，这既是作品中的人物也是作家本人，她与个体创伤和民族重负达成的和解，并在身份认同中找到了建构朝鲜族理想身份的希望。显然，比起此前朝鲜族移民叙事大都从大处着眼，寻找民族精神之“根”，许连顺已悄然将视角逐渐转向“小写之我”，如小说《蝴蝶》那样，开始寻找个体存在价值与意义的“根”，肯定人的欲望和人的需要。而她对于个体生存价值和存在精神的关注，本质上是对人存在价值的肯定。“逆移民”小说《中国媳妇》更是进一步指出生活的本质就是“平时认为的那些微不足道和毫无意义的东西”。对于每一个个体而言，相比于那些轰轰烈烈的、可以记录史册的历史事件，生活中随机发生的各种人情世故、家长里短才是真实自我价值的体现，“那是生存中的精神和勇气，是人类的希望之光。”<sup>③</sup>

## 五、结语

作为亲历时代，在中韩之间频繁穿梭的朝鲜族作家，他们不断感受着个人命运与国家发展的同频共振，在自己的“逆移民”叙事中，反复书写着如“无根花”、无家的“蝴蝶”一样“寻根”的中国朝鲜族人。他们或陷入自我怀疑的无边黑洞，或怀揣着发家致富的美好憧憬，或带着逃离现实的迫切渴望……但他们也像自己当年跨江而来的祖辈一样，面对困境，不断突破固有的生存空间，义无反顾地漫游在中韩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地理空间中，在自我认同、血缘亲情、温饱生存等各种压力的合力围剿下，逐渐清晰自我定位与族群边界。他们遵从内心，独立而坚定地回归中国，直抵人性尊严，找寻本真自我，从而使精神不再漂泊，完成了一个异质的、多重的身份之根的建构，这是朝鲜族的立足之根，也是人性之根。

尽管朝鲜族在重建自我的过程中经历了无数坎坷，甚至有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从《无根花》到《中国媳妇》的叙事演进中可见，以许连顺为代表的朝鲜族作家在对话历史的过程中，逐步完成了从欲望否定、欲望肯定到欲望超克的精神跃升。他们最终摆脱二元对立的思维桎梏，选择走向和解之路，逐步建立起一种家国同构的稳固逻辑。可以说，朝鲜族“逆移民”三部曲本质上是关于和解的叙事——既是人物与自我命运的和解，也是作家与历史记忆的和解。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作家在主体身份建构问题上展现出一种深具人文精神的乐观态度。他们寄希望于人与人之间的共情与沟通，倡导一种包容性的伦理关怀，从而为朝鲜族新的身份认同赋予了更为广阔而深刻的内涵。三部曲所完成的，不仅是一个民族从离散到回归的精神史书写，也在全球化语境下，为所有面临文化认同困境的群体提供了一种超越创伤、走向和解的叙事可能。它们见证了一个民族在时代巨变中寻找自我的艰难历程，也昭示了文学在缝合历史伤口、重建精神家园方面不可替代的价值。

[责任编辑 全红]

① 许连顺：《中国媳妇》，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06页。

② 许连顺：《中国媳妇》，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07页。

③ 熊修雨：《从“寻根”到“先锋”中国当代文学观察》，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6年，第171页。